

蘇北人在上海遭受的 偏見與歧視

——《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述評

● 吳 垠



韓起瀾 (Emily Honig) 著，盧明華
譯：《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遠東出版社，2004)。

《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
(以下簡稱《蘇北人在上海》，引用
只註頁碼) 一書是美國學者韓起瀾

(Emily Honig) 的著作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的中譯本，是研究從上海開埠到1980年代百多年間上海蘇北移民社會文化境遇的專著。

作者韓起瀾是耶魯大學的歷史學者和婦女問題研究專家，她在上海史研究領域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她的另一部成名作《姐妹和陌生人：在上海棉紡織廠的婦女，1919-1949年》(*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研究了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期間上海棉紡織企業中女工的狀況。另外，她還研究了中國婦女在1980年代的境遇^①。

眾所周知，上海人對於蘇北人有着十分嚴重的偏見。對於很多上海人而言，「蘇北人」或「江北人」這個標籤往往是與不文明、落後、沒文化等負面形象聯繫在一起的。韓起瀾此書運用了人類學族群研究的

《蘇北人在上海》是研究上海開埠到1980年代百多年間上海蘇北移民社會文化境遇的專著。對於很多上海人而言，「蘇北人」或「江北人」這個標籤往往是與不文明、落後、沒文化等負面形象聯繫在一起的。

視角來探索「蘇北人」這個社會另類在上海被建構的過程及其含義變化，理論獨特，分析精到。

一 思考社會集團的方法

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實際上涉及到了對某一籍貫移民的特殊看法，而韓起瀾也指出，籍貫對於中國人的自我和群體觀念十分重要。但她的這本書既不是泛泛地談論籍貫，而是探討一個特定的社會類別；也不是泛泛地談論蘇北人，而是探討他們在上海的特殊經歷。

韓起瀾把上海的蘇北移民群體理解為一個族群(ethnicity)。她在開篇即介紹了人類學族群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主張不要把族群理解為單個身份，而要理解為一種社會關係體系。這就是說，身份只是在特定地方背景和歷史背景下同其他身份的關係與區別中形成的，在研究中要探索族群具有象徵性的、被社會建構出來的身份。

該書強調了族群研究理論的幾個基本觀點：

第一，族群不是諸如血緣之類的客觀事物，而是一種過程。更具體地說，「它涉及到建構、援引和玩味文化獨特性概念，以便在共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內將人與人之間劃分己類與另類」。語言、種族、宗教、歷史經驗和原籍是用來建構這種「己類／另類」界限的基本屬性。但是，必須強調指出，「構成不同的或者獨特的語言、種族、歷史或原籍的要素全是有伸縮性的。沒有哪一個特徵天生就是族群的

標誌。……某個特定屬性，例如體貌、衣着、講話、生活方式或宗教，只有憑藉體現它的內涵體系才具有族群意義或標誌意義。」(頁7)

第二，沒有哪一個人群天生或不可改變地構成一個族群；換句話說，族群取決於族境。就蘇北人這個族群而言，蘇北人在蘇北並不能夠成為所謂的「蘇北人」，只是在上海才成為「蘇北人」。

第三，「誰來界定社會類別」是一個關鍵問題。「被劃分感」是外在決定的，旨在從屬和統治。

第四，關於族群同階層的關係。階層和族群的根子都是不平等，但階層是根據一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來界定，而族群是以基於原籍的差別來界定。有關族群差異的信念常常被用來解釋或文飾職業上的等級結構(頁7-8)。

與上海蘇北人的境遇相類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也有一批來自西南部的「俄克佬」，韓起瀾對兩者進行了比較。在1930年代，美國乾旱沙漠地區得克薩斯、阿肯色和密蘇里諸州的部分移民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央谷重新落戶。作為移民，他們完成了加利福尼亞本地人不願幹而以往由墨西哥移民來完成的農業生產任務。儘管俄克佬同本地人一樣都是白人，但被當作「卑微和異化的社會集團」來對待。在加州稱某人為「俄克佬」，就像在上海稱某人為「江北佬」(老江北)一樣，成為一種流行的貶義措辭，意謂落後、貧窮、低劣。簡言之，「俄克佬」這個稱謂成為下層階級的一個隱喻。而俄克族群最初不是由移民自己建構的身份，而是他們同加利福尼亞

作者把上海的蘇北移民群體理解為一個族群。族群取決於族境。就蘇北人這個族群而言，蘇北人在蘇北並不能夠成為所謂的「蘇北人」，只是在上海才成為「蘇北人」。

本地人發生關係的產物(頁3)。在此類比的基礎上，韓起瀾指出，蘇北族群的源起不是基於傳統，而是在上海被建構的。

二 移民城市中產生的特殊族群

(一)「另類」的形成

上海本身是一個「混合雜居」的移民城市。從十九世紀中葉起，該市作為一個商業和工業都市開始發展起來。上海的勞工、商人和中小企業主大多數來自三個地區：廣東、江南(浙江的寧波—紹興地區和江蘇的無錫—常州地區)和江蘇北部(即蘇北)。上海的精英集團主要由來自廣東和江南的人組成，非技術性的服務行業則主要由來自蘇北的移民充任。

蘇北移民多半是由於洪水、饑荒或家鄉戰爭而逃難到上海的難民，因而其初始的社會經濟地位十分低下。「蘇北人在上海所從事的職業是最不賺錢、最差強人意的營生」(頁1)。他們佔了不熟練勞工隊伍的大多數——黃包車夫、碼頭工人、建築工人、拉糞車工、理髮匠、澡堂侍者。大多數蘇北人居住在上海市區邊緣的貧民窟裏，用蘆葦麥秸、紙板和能夠找到的隨便甚麼廢料搭蓋棚屋。

貧民窟、低等職業，招致了社會對蘇北人的歧視和不公正的對待：

稱呼某人為蘇北豬獃就意味着這個人即使實際並非來自蘇北也是窮困、無知、骯髒和鄙俗的。大多數

蘇北人生活的聚居區被認為是粗野的地區，父母告誡他們的孩子不要進去。大學畢業生最怕日後被分配到蘇北居民區裏的學校去教書。最後，誰也不希望同蘇北人結婚。年輕人，包括蘇北家庭出身的年輕人出去找對象，幾乎總是指明對象不要是蘇北人。(頁1)

事實上，在上海，江南人和蘇北人都是移民。在很大程度上，由於江南人竭力要僭取「本地人」這個地位，宣稱上海是他們的上海，因此他們誇大了自己與蘇北人的區別。

在社會衝突理論的框架下考察偏見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偏見是在競爭稀有資源、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的過程中被建構的。江南移民為聲稱自己是上海人而作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於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存在着一個受人鄙視的蘇北人集團——在上海發展成為現代工業中心的整個過程中，這一信念一直處於重要地位。在界定自我時，只有與作為反襯的另類進行對照，才能使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容易理解，而蘇北人就代表那個另類。

韓起瀾在這裏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即「蘇北人」是如何界定的。在多數上海人看來，「蘇北人」的界定顯而易見。從地理上講，來自長江以北的人被認定和統稱為「江北人」。從方言上講，蘇北人被形容為「操一口江北腔」的人。然而，一問及更加具體的問題，「蘇北」的定義便顯得難以捉摸了。因為長江以北的江蘇有三個大區：北區(淮河以北)、中區(從淮河南下

在上海，江南人和蘇北人都是移民。由於江南人竭力要僭取「本地人」這個地位，宣稱上海是他們的上海，因此他們誇大了自己與蘇北人的區別。蘇北人也成為了另類。

在上海的環境中，江南和蘇北都被簡單化了，都被當作象徵來用。江南是富足和高雅的體現，而蘇北則成為貧困和窮鄉僻壤的體現。蘇北隱喻式的象徵意味要重於它的實際狀況。

至揚州)和南區(長江北岸地區)，而長期以來學者對於蘇北究竟是否包含這三個區的全部還是一個或兩個部分，始終莫衷一是。

事實上，「蘇北不是一種有着明確劃界的行政建構。它既不是省份也不是縣，它是一個不存在始終如一定義的地區」(頁19)。它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地方，而是代表一種對一個特定地區的地理、文化、語言和經濟同質性的信念，而且，這種同質性的信念本身是在歷史過程中被建構的。

如果說長江以北的江蘇地區有甚麼內聚性的話，那就是它同蘇南的鮮明反差。我們可以部分地把蘇北理解為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地方，而是另類的代表，有別於江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江南遺忘之地。在上海的環境中，江南和蘇北都被簡單化了，都被當作象徵來用。江南是富足和高雅的體現，不論其內部有多大差別；而蘇北則成為貧困和窮鄉僻壤的體現，無論其是否豐富多彩。簡言之，蘇北隱喻式的象徵意味要重於它的實際狀況(頁25-26)。

只有作為移民，他們才遭遇偏見和歧視；只有作為移民，他們才第一次被貼以「蘇北人」的標籤：江南人和蘇北人的這種面對面遭遇導致人類學家所謂的「界標」的形成，從而開始了族群形成的過程。

(二) 在移民結構發生改變後偏見依舊

在1930至40年代，蘇北廣大地區為日本人佔領，導致許多人背井

離鄉。這一時期上海蘇北移民的經濟地位與早先來上海的蘇北移民有所不同，他們多半是地主、小工商業者或學生。但是，更大數目的非貧民移民的到來，並未在上海人心目中改變蘇北人等於貧窮落後這個刻板印象。其實，偏見的特點之一就是不易改變。

從建構主義與衝突論的視角，韓起瀾指出，江南精英集團不斷需要一個另類。要說有甚麼不同的話，對蘇北人的嘲弄在富裕移民到來之後也許加劇了，因此，這些富裕移民的到來，潛在地對江南人群體自詡為「上海精英文化代表」的訴求構成了挑戰(頁39-40)。

(三) 殖民主義為「蘇北人」類別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

韓起瀾犀利地指出，殖民主義為「蘇北人」類別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正是外國人強加了關於現代城市應為何物和蘇北人被認為是這一理想中的一個瑕疵的信念。沿黃浦江碼頭興建的英式建築大樓和「法國城」的別墅，凸顯了蘇北人居住的棚戶區的破爛不堪；歐洲服飾彰顯了蘇北人衣着的破舊襤褸；首批從國外進口的有軌電車和汽車使許多蘇北人拉的黃包車更顯落後(頁11)。外國對上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統治也以其他方式影響了「蘇北人」這一社會類別的建構：

第一，上海外國工業的發展對江蘇農村經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加劇了該省以長江為界的分隔，從而使江蘇南北逐漸分別代表了富與窮。倘若上海不是通商口岸，那就

很可能沒有一個被稱為「蘇北」的地方。

第二，外國投資構築了上海的勞動力市場，致使某些職業由於屬於現代產業而被界定為地位高的職業。所謂「現代」則多半是由外國人界定的，地位低的職業則是同蘇北人相聯繫的職業，這一點必須聯繫到外國控制下的經濟才能理解。

最後，儘管江南精英集團在建構「蘇北人」這個類別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他們自身也是處於從屬地位的。在很大程度上，江南人以上海人自居是由於他們同外國人的聯繫，即便這種聯繫只不過是崇尚並模仿洋人。與之相反，蘇北人之所以落後是因為他們不懂也模仿不了西洋的生活方式。

這一點讓筆者聯想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甚麼是「現代」，甚麼是「落後」，而對於所謂的「現代」生活與工作方式的不同接受程度，成為中國社會中偏見與歧視產生的根源之一。比如，農民工進城之所以被城市人歧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兩個群體對於生活方式理解的不同所造成的。

(四) 蘇北文化在上海的邊緣化

蘇北人在上海遭受的偏見與所處的弱勢地位，也體現在蘇北文化在上海的邊緣化。從方言、戲劇、衣着到食品，蘇北的影響或風格都被排斥在溫文爾雅的上海文化之外。上海的時尚和溫文爾雅只反映了寧波、紹興、無錫等地的風格。

以戲劇為例，蘇北人喜愛的淮劇在舊上海幾次瀕臨絕境。其實，

上海的戲劇都是隨着外省市人進入上海的。淮劇較早受到崑劇、京劇的薰陶，結合維揚、江淮等地的方言和風情，創造出自成特色的優美曲調和動人舞蹈。然而，淮劇在舊社會連二、三流的舞台也挨不上邊，只能像草台班似的，在馬路上搭個棚進行演出。淮劇的唱、做功夫，絕不遜於其他地方戲，然其遭遇卻是如此不堪，差一點從上海灘消失，這與蘇北人的社會地位是直接相關的。

三 「江北漢奸」——被製造的「替罪羊」

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國難當頭的緊急情況下表現得更為突出。在1932年「一·二八」事件日軍進攻上海後的幾個月內，蘇北人史無前例地成為被責難的對象。他們被當作日軍滋擾上海的許多犯罪活動的替罪羊。一些報紙刊登文章，標題如「江北流氓搶掠閩北人民」。更為嚴重的是，上海人普遍認為蘇北人中有人巴結日本人，一個新的名詞「江北漢奸」出現了。事實上，儘管有蘇北人在日本傀儡政府裏佔據高級職位，但並非所有傀儡政府成員都來自蘇北。問題是，少數蘇北人成為傀儡政府領導人的證據，足以給一種尚在流行的先入之見火上加油(頁89)。

可以說，「江北漢奸」是一種預設的體現——這種預設反映了早已存在的對蘇北人的蔑視，也反映了要把通敵罪歸咎於某種人的需要。

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表現得更為突出。上海人普遍認為蘇北人中有人巴結日本人。「江北漢奸」這種預設反映了早已存在的對蘇北人的蔑視。

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告訴我們，當個體或群體處於挫折狀態時，會傾向於攻擊不受歡迎、看得見，並且相對弱勢的團體成員。在這裏，蘇北人成了被製造的「替罪羊」。

四 蘇北人的自我認同

既然蘇北人這個族群在上海遭遇如此嚴重的歧視，那麼，蘇北人的自我認同又如何？他們是否認同上海人給他們所貼上的標籤呢？韓起瀾認為，由於蘇北作為一個地方和蘇北人作為一個類別的概念只是伴隨着江南和上海的發展才出現的，所以，任何有關蘇北族群的身份感，只有通過移居和在上海生活的經歷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大多數蘇北人來到上海之前很可能從未聽說過「蘇北」這個說法。具體來說，他們剛到上海時似乎並沒有自我認同為蘇北人，而是認為自己是揚州人、鹽城人，或南通人（頁75）。多數蘇北移民對於「蘇北人」這個群體的認同並不強烈，這一點明顯地表現在同鄉會的組織上。蘇北幾乎每個縣在上海都有自己的同鄉會，但只有極少的同鄉會關注蘇北另一個縣份移民的有關問題。

儘管蘇北人在江南人眼裏近似於一個族群，但對那些實際是從長江以北各市縣移居上海的人來說，大蘇北的認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微弱的，或者根本不存在。一點表現是他們從未在某種形式的蘇北權利運動中團結起來，抗議對他們的歧視待遇。對他們來說，同鄉是指同一個特定市縣的人（如揚州或鹽

城），而不是作為整體的蘇北。因此，韓起瀾認為，他們的自我認同更多是所謂的「屬地認同」。這就證實了人類學族群研究的一個結論，即外部人強加給一個集團的定義與集團內部人關於他們自身的定義之間是有差別的。

蘇北不同原籍的人有一定的分離感，甚至延伸至對立態度，往往是來自蘇北比較繁榮的南部地區的人對他們的北鄰表示輕蔑。例如，揚州人經常對鹽城人表示輕視，恰恰同江南人對蘇北人的態度一模一樣。揚州人的優越感有時走到極端，以致有人堅持認為揚州根本不是蘇北的一部分（頁79）。儘管上海人總是把蘇北人同苦力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來自不同地方的蘇北人，其工作類型也有所不同。一般說來，揚州人幹的活比那些以原居更北地區的人為主力的工作需要稍高一點兒技能，工作條件也比後者好一些，他們以所謂的「三把小刀」（理髮刀、修腳刀和廚刀）而聞名。來自鹽城和阜寧的移民則主要拉黃包車。事實上，蘇北移民的屬地認同就如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一樣，其背後都存在某種階層隱語在運作。

蘇北人對於上海人或江南人強加給自己的標籤不認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標籤具有負面性，有損自尊。不同屬地的蘇北人使用着某種策略來建構其身份。正如蘇北身份的表述對於江南精英來說是一種有關階層的話語，蘇北人所作的鹽城人、揚州人或南通人的身份表述也是說明階層差別的一種方式。因此，我們不應當把蘇北人

蘇北人對於上海人或江南人強加給自己的標籤不認同，可能因為這一標籤具有負面性，有損自尊。不同屬地的蘇北人也使用着某種策略來建構其身份。因此，我們不應當把蘇北人看作是上海族群身份建構中的被動參與者。

看作是上海族群身份建構中的被動參與者。

這讓筆者聯想到，時至今日，揚州、南通人樂於稱自己來自「蘇中地區」，而非「蘇北地區」，其背後也存在着某種話語策略，即與貧困落後的形象劃清界限，而與現代化大都市上海拉近距離。

五 偏見與勞動力市場地位 (歧視) 循環效應

1949年以前的上海，吸收江南人和蘇北人的職業是分層級的，蘇北人幹的往往是工資低、地位低的活兒。在工廠，蘇北工人往往從事更苦、更累的工作。根據韓起瀾的分析，偏見與蘇北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並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關係，「說先有偏見而後才有低下的經濟地位，那將是誤導的」(頁69)。對蘇北和蘇北人的成見部分地是上海勞動力市場分化發展的產物。事實上，對於蘇北人的流行偏見很可能阻止他們進入更好的勞動力市場，但勞動力市場內部的劃分本身也促進了這些信念的建構。

在中國地緣文化的影響下，私交和同鄉關係對於求職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經理部和主管職位的人往往僱用親戚、朋友或同鄉人。因此，重要的問題是，同來自江南的人相比，蘇北人有些甚麼樣的關係可以利用。事實上，在上海的蘇北精英大多集中在黃包車公司、理髮店、澡堂和建築業，只有少數人染指工業和銀行業；而上海實業界的精英以江南人為主。蘇北人幹活

的場所正好就是他們的同鄉所擁有和管理的行業。

在江南老闆看來，蘇北人是不合心意的工人，他們通常被認為貧窮和沒有文化。江南工人為保護自己的地位，可能大大地促進或者至少是強化了某種信念，即認為他們自己與蘇北人之間存在明顯區別，從而形成了某種「族群敵意」(頁69)。於是，蘇北人在上海勞動力市場上的遭遇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六 偏見的制度化與社會化：1949年以後的上海蘇北人

1949年以後，對蘇北人的流行偏見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內化到上海人思想中的一種文化傳統。

蘇北人這個類別依然意味深長的最直接、最顯眼的證據是語言，說到蘇北人時的貶義性提法充斥於上海人的語言中。「江北人」等稱謂，仍然是上海方言中的罵人話之一。這些說法不僅被用來指稱名副其實的蘇北人，而且也被用以斥罵地位低下或不講道理的人。例如，說話粗俗的人被斥為「講江北方言」；未能達到清潔標準的人被譏為「像江北鄉巴佬」(頁98)。

在這裏，對蘇北的偏見被制度化了。所謂制度化的偏見是指「如果刻板信息和歧視行為被一個社會看作是一種規範的話，只要生活在這個環境中，我們大多數人便潛移默化地具有了某種程度的偏見態度和歧視行為」^②。在上海人的心中，另類的蘇北人已成為一種文化。

在江南老闆看來，蘇北人是不合心意的工人，他們通常被認為貧窮和沒有文化。江南工人為保護自己的地位，可能大大地促進或強化了某種信念，即認為自己與蘇北人之間存在明顯區別，從而形成了某種「族群敵意」。

從上海人的觀點看，蘇北人是一種不同的族群秩序。這些差異究竟是現實存在，還是被上海人扭曲和誇大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人相信差異存在。他們還樹立界標，從而維持我們／他們的兩類劃分。

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綿延不絕的另一個表現是通婚情況。我們知道，婚姻是社會距離的一種測量尺度，而上海人的擇偶標準之一就是：必須不是蘇北人。究其原因，其一是一些上海人把蘇北人同貧困相聯繫，認為同蘇北人結婚是社會階層地位的向下流動；其二是因為生活習慣與習俗的差異。

就蘇北人自身而言，他們往往費很大力氣來掩蓋其身份。最常見的辦法是，他們在家外或在鄰里不講江北方言，部分是為了避免惹麻煩，但也是為了確保不讓任何人確認其蘇北人身份。對於蘇北人身份的掩蓋從側面說明了現實中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之嚴重。

韓起瀾指出，從上海人的觀點看問題，蘇北人依然是一種不同的族群秩序：他們不僅來自一個不同的地區，講不同的方言；他們不僅相對貧窮，而且還有不同的文化習俗和個性特徵。這些差異究竟是現實存在，還是被上海人扭曲和誇大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人相信差異存在。他們還在呼喚和擺弄出生地、語言和文化習俗來樹立界標，從而維持我們／他們的兩類劃分。

七 小結

韓起瀾的這本著作運用族群學的方法來研究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與歧視，視角獨特，分析深入，材料扎實，既包括文獻考證，也有實地訪談和調研。這些都是值得推崇的。

不過，國外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問題在於材料上的限制和文化上的隔膜。由於他們以一個「他者」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問題，局外人的身份和文化的差異使他們無法十分準確地把握一些細節問題，甚至可能出現偏差。例如，韓起瀾根據既有文獻分析指出，「語言並不提供任何明顯的、直截了當的蘇北定義」（頁24）。而實際上，上海人對於自己的語言——吳方言的優越感，在上海人對蘇北人偏見形成過程中有着重要作用。這一點在書中並沒有得到詳細的分析。

當然，韓起瀾這本書的分析重點在於1949年之前，也即上海人對蘇北人形成偏見的早期，兼及1949年後的一些情形。那麼，在今天的上海，在這個人口流動迅速、各地移民數量迅速增加的現代化大都市，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是否有所改變？或者這種偏見又有哪些變異的表現形式？這些其實是很有學術趣味的話題，有待今後的研究加以探索。

註釋

① 邵建：〈研究上海蘇北人的力作——韓起瀾《上海蘇北人》評介〉，《史林》，2001年第2期，頁104-108。

② 阿倫森(Elliot Aronson)、威爾遜(Timothy D. Wilson)、阿科特(Robin M. Akert)著，侯玉波等譯：《社會心理學》，第五版(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5)，頁411。

吳 垠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07級碩士研究生